

「左派」與「右派」

馮進

我在安娜堡讀書的時候，導師是梅儀慈教授。第一次見到她，梅老師齊短髮，戴着眼鏡，衣着很樸素，行動很利落。有一回系裡給她慶祝生日，我才知道梅老師已經七十歲了，可是望之如五十許人。從消息靈通的學長那裡又得知，她的父親就是五四時期同魯迅打過筆帳的著名「保守派」，和吳宓一起主持《學衡》雜誌的梅光迪。梅老師研究五四文學，早年有關於丁玲的左派文學的學術專著被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表。丁玲上世紀八十年代復出後訪美，曾住在梅教授家中，聽說老太太還閒不住，幫着打掃房間等。談到她與父親截然不同的治學之路，梅老師笑着說父親的老友曾說她是「不孝」之女。所以她晚年研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社群，特別是她父親參加的「右派」學術派，也算是繼承父業、以盡孝道的意思。

梅老師曾在浙江大學讀過一年書，以後進入美國著名女子大學芒荷莉大學（Mount Holyoke College）。後來，她嫁了她在哈佛讀博士時的同學、一個研究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猶太人。他曾在本校歷史系當教授，不過我拜在梅師門下時，她的先生已經退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梅老師作爲訪華的第一批美國文化教育人士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在蘇州參觀時，她脫口而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隨行的中國翻譯、導遊和其他工作人員態度馬上親熱起來。因爲之前看她和一幫金髮碧眼的老外在一起，卻又是中國人模樣，他們都拿不準到底應該怎麼接待她，算「美國友人」還是中國人？說到此處，梅老師說：「可見，熟悉中國古詩是中國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誌啊。」

梅老師不但是個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個很善於教學的老師。我從她那兒除了學治學的方法，也學做人的道理。我到安娜堡以前，梅老師就交代師兄要幫我熟悉本校的情況並把自己家的電話號碼給了我。我入校以後，梅老師教授的研究生討論課（graduate seminar）是我每學期必選的。上她的課，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極善於調動學生的討論。彷彿也沒聽她說多少話，可是課堂氣氛異常活躍，真有無為而治的風格。

以後聽她介紹教學經驗，才知道她從教四十年，每次上課前都還要精心設計，並不是貿然說到哪兒是哪兒。上過梅老師的課，經過和同學們的討論鍛鍊，我才漸漸體會到什麼是有創意的論點，什麼是嚴謹的治學態度。梅老師批改論文也極爲細心，但她改的往往是大的經絡關鍵點，決不因爲細節文法抹殺了學生文章的閃光處。我想，她深得錢鍾書再三稱讚的牛津大學「導師制度」（tutorial system）的精髓。以後我自己批改學生論文時，還能從她的榜樣中受到啓發。因爲她對我的論文反饋及時又切中要害，讓不少同學羨慕我有這樣一位導師。每學期上完她的課，她還都要請我們這些學生吃飯，平時上三小時的討論課她也常常帶些巧克力餅乾之類的小點心來，嚴格之外也有慈愛的一面。

梅教授和我攀談，起初講的都是學業方面的事，以後就漸漸說起她的親朋故舊、同學老師。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如何從廣東千里迢迢地坐船去考東南大學，又如何同在那裡教書的、留美歸來的梅光迪結爲夫妻。梅教授的父親早逝（一九四五），是她的母親獨立帶大了四個孩子，並且想辦法在抗戰勝利後一起移居美國。梅教授說起這件事，很爲母親自豪。因爲四個孩子中，她的小弟出生在中國，本來無法進入美國。可是她的母親聯繫到了父親生前在哈佛的朋友去國會游說，最終由杜魯門總統簽字，通過一項法案，允許美國公民未成年的子女入境。去年我回母校，又見到了八十多歲的梅教授。她依舊不見老，雖然腿腳不如以前方便，需以手杖代步，但說起退休之後的種種活動，還是興致勃勃。現在我一面參加各種講座和音樂會，一面也給美國人講課，介紹中國文化。「教書能讓人永遠年輕。」她笑謔地告訴我。

讀書的時候，導師是梅儀慈教授。

第一次見到她，梅老師齊短髮，戴着眼鏡，衣着很樸素，行動很利落。

有一回系裡給她慶祝生日，我才知道梅老師已經七十歲了，可是望之如五十許人。

從消息靈通的學長那裡又得知，她的父親就是五四時期同魯迅打過筆帳的著名「保守派」，和吳宓一起主持《學衡》雜誌的梅光迪。

梅老師研究五四文學，早年有關於丁玲的左派文學的學術專著被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表。丁玲上世紀八十年代復出後訪美，曾住在梅教授家中，聽說老太太還閒不住，幫着打掃房間等。

談到她與父親截然不同的治學之路，梅老師笑着說父親的老友曾說她是「不孝」之女。

所以她晚年研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社群，特別是她父親參加的「右派」學術派，也算是繼承父業、以盡孝道的意思。

這就是擺

這就是擺